

## 有温度的“汉学”：汪德迈先生的学术情怀\*

王邦维

谢谢会议的邀请！我很抱歉，汪德迈的书，我过去读得很少，或者说基本上就没读过。这次金丝燕和董晓萍两位教授邀请我来开会，我临时抱佛脚，找来汪老的几本书，书是董晓萍教授送给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这几种，其中包括今天大家讲得最多的《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匆匆读了一下，读的结果，可以总结为一句话：非常受益。受益的同时，也有一些感想，现在就结合今天会议的主题，向大家报告我的感想。为了跟大家一样，像个发言，我拟了上面这个发言题目，与汪老有关，也与法国的汉学有关。

我的发言包括三点。

首先第一点，我想到汪老作为法国学者，他所承接的学术传统。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会议的通知，除了汪老的名字外，还专门提到了另外两位法国学者的名字：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我们知道，汪老年青求学时，他的老师中最重要的，是戴密微。戴密微也有老师，戴密微的老师中，最重要的有两位，一是沙畹，还有一位是列维。从汪老往前追溯，我们不能不想到、不提到这几位法国学者，也不能不想到法国的汉学和东方学的传统。

沙畹出生在法国，一生的活动也在法国。戴密微虽然出生在瑞士，但后来加入了法国籍，一生多数时间也在法国，所以一般也被看作是法国学者。

---

\* 本文原为在2021年5月14日“汪德迈中国学研究国际会议暨《汪德迈全集》出版发布会”上的讲稿大纲，本次发表时略有修改。

我自己过去研究的一些问题，正好也跟这几位法国学者有一些关系，因此我也就多说几句。

戴密微的研究，虽然我们通常称之为汉学，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戴密微在20世纪20年代，1924至1926年，曾经在厦门大学工作过。他在厦门大学一方面自己做研究，一方面教梵文。戴密微当年的成名作，是研究一部汉译的佛教经典《那先比丘经》（*Les Versions chinoises du Milindapañha*），这就是一个跨文化的题目。另外，戴密微还研究过汉藏佛教、印度佛教，研究中引用了多种语言的材料，其中最著名的著作，就是他的《拉萨僧诤记》（*Le Concile de Lhasa: Une controverse sur la quiétisme entre bouddhiste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au VIIIème siècle*）。

戴密微不仅在中国工作过，也在日本工作过。他在日本的时候，接手了他的老师列维的工作，主持编一部多册的佛教辞典，书名叫 *Hobogirin*，汉字书名《法华义林》。在汉学研究方面，戴密微还研究中国古代的诗歌，也做翻译。戴密微和香港的饶宗颐先生关系很密切，关系很好，这是原因之一。

比戴密微更高一辈的学者是沙畹。沙畹其实是我到北大以后知道的第一位法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初，我做硕士论文，就接触到他的研究。他把中国唐代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翻译成了法文（*Mémoire composé à l'époque de la grande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par I-Tsing*），这是这部书最早的一个西文译本。不仅是简单的翻译，翻译时加了很多很详细的注释，对这部书的内容做了很多考证，研究的成果主要就体现在撰写注释中。我的硕士论文也是研究这部书，也主要是做注释。沙畹的书，是我当时做这个题目研究的参考。当然，沙畹研究的范围远不止这一些，他做的工作很多，比如《佛经中的五百故事》，这是篇幅很大的一部书，内容包括从汉译佛经中选出来并翻译的五百个故事。他的跨文化研究还有《西突厥史料》，还有对“礼”的研究、对泰山

的研究。对中国华北佛教遗址，都做了很多调查。沙畹还翻译了《史记》，五大卷，在欧洲基本上可以说是经典性的《史记》的翻译。

还有列维（Sylvain Lévi）。列维也是法国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不过一般不把列维算作汉学家，而是算作印度学家。列维研究的范围也很广，印度的梵文佛经，涉及汉译佛经，还有一些中印文化交流史中的问题，例如对唐初王玄策出使印度的经历，他都做过考证。戴密微的研究，能够在汉学、藏学、印度学、佛教学中交替转换，就是因为他跟列维学习过，受到了列维的影响。

总之，仅仅只从这三位法国学者的身上，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就能看出，法国汉学的传统：范围广，在东方学的大背景下，往往与印度学、佛教学结合，最具有跨文化研究的特点。

欧洲的汉学研究传统，不好说就是从法国开始，但迄今为止，研究范围最广、成就最大，很多领域至今仍然保持高水平的，的确还是法国或者说法语区。

汪老的研究，继承了沙畹、戴密微。在他们的基础上又有所推进。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我讲的第二点，是我发言题目中的“有温度的汉学”。

“有温度”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把法国的汉学，与英国的汉学、德国的汉学比较，几家之间，会有什么不同呢？以我个人的感觉，不同就在于法国的汉学，比较地有“温度”。

“温度”体现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英国的汉学虽然比较有绅士派头，但很多情况下深度上要差一点。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20世纪初，从中国流散到国外去的敦煌写卷和文物，英国收藏了很大一部分，法国也收藏了很大一部分。除了中国自己，就数量上讲，英法的收藏是最多最大的两家，而且英法的收藏质量都很好。英法两家，后来都编了目录。拿英国学者编的敦煌汉文写卷目录与法国编的目录比，法国伯希和编的，就比英国学者小翟理思（L. Giles，或称翟林奈）编的要强得多，水准

要高得多。虽然这个目录伯希和自己没有编完，后续的工作是其他法国学者完成的。这里应该补充的还有一点，伯希和也是戴密微的老师之一。

再有德国的汉学，我的感觉是，讨论的范围比较窄一些，当然也有优点，优点是比较谨慎，但从另一方面讲，就是显得比较拘谨，甚至清冷，没有法国汉学的尺度放得那么宽，思想那么活跃。这似乎比较符合德国人的性格。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情況。欧洲的学术，“二战”以后也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欧洲似乎要成为一体了，地区的区隔和差别已经没有过去那样明显。

20世纪前期的汉学，法国人非常活跃。这包括到中国来做实地的考察和调查，跟中国学者做直接的互动。典型的就是沙畹和伯希和。随便举个例子，中国的云冈石窟，很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很早，1907年，沙畹就去过，做了调查和记录，直到现在，沙畹调查云冈所收集的资料，包括照片，对于研究云冈石窟在上个世纪初的保存状况，都很重要。也就是这个原因，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中间提出，要去看云冈。蓬皮杜肯定是读过沙畹的书，否则不会有这样的举动。当时还是在“文革”时期，情况很特殊，由此周恩来总理专门陪同蓬皮杜，也去了云冈。1907年沙畹对中国华北地区文化遗址的考察，留下的其他材料也很丰富，很重要。

所以，我的一个印象是，法国的汉学，整体上讲，讨论的问题，基础深厚，涉及各个方面，迄今为止，法国汉学的研究范围最广，应该说成就也最大，而且更多地具有一种同情心。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学者，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从了解到解释，再到理解。从解释和理解，再到喜欢和赞赏。从喜欢和赞赏，再到更深更多的解释和理解。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样也显得更有亲近感。我说的“有温度的汉学”，就是想说明在我看来的，法国汉学的这个特点。

最后，第三点，回到汪老个人的话题来，我想说一下我对汪老学

术的理解，具体地讲，在法国学术的背景下，汪老怎么继承了法国汉学的传统，又有了怎样的提升。

我手里有两本书，这是1991年1月我在巴黎，好像就是在法兰西学院，拜访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他送给我的。施舟人也研究汉学，主要是中国道教，他虽然不出生在法国，但在法国学习，在法国做研究工作多年，也属于法国汉学圈的学者。两本书是一套，是论文集，书名是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一本出版于1966年，一本出版于1974年，当时大概是因为戴密微即将退休，学术界的朋友们为了对戴密微的学术成就表示敬意而出版的。论文的作者，大多都是当时欧洲最有名的一些汉学家和印度学家。论文集的第二册，有汪老的文章。这次开会，想到戴密微，又想到汪老，因此昨天又找出来翻看了一下，主要翻看汪老的文章。

汪老的文章不算很长，一共21页（313—333），讨论清末的一部小说，《官场维新记》。这在中国是一部很不起眼的小说，写成于晚清，作者不知道是谁，最早是刻本，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印出来，小开本，110多页。汪老对这部小说撰写的背景和流传的历史做了仔细的考证。汪老发表这篇文章是在1974年，那时46岁。

我昨天也在知网（CNKI）上查了一下，过去七八十年，这部小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只有阿英编的清代小说目录提到了一下，除此之外，竟然没有任何一篇研究的论文。这真让人奇怪。

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样。在看到汪老的文章前，我知道清末有所谓的“谴责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官场现形记》，我这时才知道，“谴责小说”中还有这么一部小说。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我自己孤陋寡闻。不过，不管怎么说，汪老当时能够注意到这样一部小说，说明他的眼光很宽。我们现在很多使用得非常频繁的词语，都出现在这部小说中。例如：忍无可忍，挨（勾）肩搭背，一口咬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揽权纳贿，有利可图，钦佩莫名，一哄而散，字里行间，不胫而走，等等。我们现在编撰汉语词典，这都是语料，也是语料的

出处。

而且，今天读这本《官场维新记》，也不是没有现实意义。我们发现，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中国，有的事变了，有的事没变。这中间包括语言，也包括其他一些方面。

回到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来。我以为，最近几十年，汪老这一辈汉学家又对法国汉学做了提升。法国方面不说了，中国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现在陆续出版《汪德迈全集》，是一个例证。

汪老对甲骨文的研究，我其实不懂，但我的一个感觉是，他对文字和语言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提出“汉字的理性”，要点是“理性”。这很重要。文字、书写系统对中国文化性格和特点，乃至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走向，有极大的影响。这一点，汪老讲得特别清楚。

汪老今年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他从20多岁开始进入汉学领域，始终孜孜不倦，不断努力，在多个方面都有研究成果。从法国的汉学传统看，雷穆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和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关注中国，也关注印度。沙畹关注中国，也关注中亚。戴密微关注印度，中国的西藏、敦煌，还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学。汪老则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扩大到与欧洲的希腊罗马文化进行对比。他对中国汉字的研究非常有灼见。刚才听了王宁老师的发言，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虽然我懂不了多少，只是在学习而已。我也认为，汪老提出汉字的思维理性，把汉字与文学书写系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做综合研究，很重要。汪老从文字来讨论一种文化的性格、一种文明的性格，让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汪老对法国汉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世界汉学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汪老所做的研究，可以说不仅是与时俱进，而且是更上层楼。汪老爱中国。从汪老对中国的语言、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特别的学术情怀。这样的情怀，我们不仅要赞赏，而且要学习。